

【国学随笔】

□徐宏力

钱钟书先生认为,“大抵学问是荒村野老屋中,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。朝市之显学,必成俗学。”“素心”两字用得精彩,让人惊叹钱先生对汉字把握的老到。素心怕是也要素胃,荤腥多了难免俗腻。自由不必朝别人索取,只要自己想成自由人,即便人身不自由,人心也是自由的。钱先生对朝市俗学的批评很敏锐,行政化与功利化恰是现代学术顽症,媚商媚官可以成为显学,显学未必是“学”。所以清流学者向往淡远心境,担心与现实走得太近会失于偶然与肤浅。不知你是否赞赏老屋素心的学术生活?

“秀才不出门,便知天下事”,但未必全知天下事,也未必全知天下真事,书中有假性,书房中的活动并不十分可靠。学问学问,学问的根在问,书中有问题,社会中更有。搞国故整理需要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,发展国学需要走进社会成大一统。

老屋中的老儒也有可能迷醉于“高雅”俗学。不是庸俗的俗,而是俗套的俗,虽无铜臭气,却有酸腐气。八股文的起承转合就是僵化套路。学者的格式化,催生出一些故弄玄虚的学术成果。有些论文刻意用读者看不懂的文字说些大家都懂的道理,在吃力解读那些艰难的术语与推理后,你会发现,原来作者想告诉我们做人要讲道德,直说不就完了吗?何必绕那么大的圈子,其实不

【读史札记】

□刘凤梧

海瑞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清官,也是少见的奇人、怪人。他奇在三十多岁以举人身份当了一个不入流的福建南平县教谕(教育局长)。按常规熬到退休升到七品县令也算是烧高香了,却偏偏超越了某些进士状元,一路高升到二品正部级都御史。他怪就怪在身处乌烟瘴气的明朝嘉靖时代,却偏偏不巴结上司,不请客不送礼,贪鄙成性的副都御史鄢懋卿、举世闻名的大奸首辅严嵩都奈何不了他。他还怪在生性耿介,不善交际,却偏偏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好人!死在南京任所,倒有几十万百姓自发沿途送葬,盛况空前。

海瑞的运气好,却不是他家祖坟选准了出奇的风水宝地,而是当时的大明王朝还有点正气。尽管兼职道士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,除了利用严嵩监视百官以外,他还提拔了一些忠贞耿介之臣,如浙江学政(省教育厅长)朱衡、内阁大学士徐阶等人。说海瑞运气好,就好在他当教育局长仅仅努力工作了四年,便把一个乌烟瘴气的县学整肃得井井有条,于是被朱衡慧眼识珠,连升四级提拔为县令;还好在尽管他吊打了浙直总督胡宗宪之子,并没收了胡子几千两赃银,胡宗宪竟不与他计较。

【毛泽东诗词赏析之三】

□吕家乡

饮茶粤海未能忘,索句渝州叶正黄。三十一年还旧国,落花时节读华章。牢骚太盛防肠断,风物长宜放眼量。莫道昆明池水浅,观鱼胜过富春江。——毛泽东《七律·和柳亚子先生》

作为革命领袖,毛泽东的友情主要是具有政治色彩的战友情,但有时毛泽东在抒写友情时有意淡化固有的政治色彩,诗篇反而别有魅力。《七律·和柳亚子先生》(1949年4月29日)就是一个范例。这是一首充满真挚友情的诗,又是一首富有政治思想意义的诗,前者明显地流荡在字里行间,后者却隐在文字背后,并非一眼就可看出。诗的前半首追怀了作者和柳亚子的三次交往。第一句写第一次交往。1926年5月,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,毛泽东(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)、柳亚子(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)都出席了这次会议,二人初次会晤,共同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的勾当进行斗争。诗句字面上只说“饮茶”,但彼此和知情者都不能不想起当时一同进行的反蒋斗争。第二句写第二次交往。1945年8月至10月,毛泽东在重庆和国民党进行了43天的和平谈判,其间曾邀柳

学术自闭症

说人们也知道。你是不是也读过类似的学术废话?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书时,有位同窗“学油子”,他琢磨透了学院派的话语系统,平时并不用功,但是背了很多“淋漓尽致”、“情景交融”之类的评价词汇,无论考什么题都写上去一大堆,总有碰上的,多了算我没写还不行吗?自称“沾边赖应试法”,居然屡试不爽,虽说得不到好分数,但每次都能涉险过关,幸亏他得不到好分数,否则那学问就更可疑了。

假设非要做出二选一的判断,国学是保守的还是创新的?人们十有八九会选择前者。传统文化的确比较僵化,但原始精神却活力无限,子学尤为突出,周庄的《逍遥游》是最典型的代表。当年开科取士的目的是为了检验士子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,考题是策问,答题是策论,只是到了后来,才演变为考查士子对经典知识的了解程度。国学的博大精深,使后学者从敬畏走向自我矮化,逐步丧失了挑战权威的勇气,出现了许多教条主义的腐儒与犬儒,国学守成是后发弊端。统治者为了保护正统地位,把国学当成御用工具,进一步弱化了它的变革活力。成圣后就如庙堂里的泥塑,移动起来比较费劲,尊贵了,身子就重。

五四运动开创了现代文明,但作为发展的代价,也将传统妖魔化了。国学家们不得不进入生存保卫战,且战且退,最后在书斋里守住了地盘。象牙塔

海瑞的运气

当时朝野之中,王阳明的“心学”已颇有市场,上至内阁大学士徐阶、翰林张居正,下至山野樵夫都有人身体力行。他们虽不像后来的东林党人那样呼朋引类,却也暗中探讨学问,危困之中坚持“知行合一”,急难之时互伸援助之手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这伙人是当时中国的“脊梁”。如果没有这些人,大明朝或许提前百年就呜呼哀哉了!

朱衡后来升任吏部侍郎(主管考察任免干部的副部长),所以海瑞没干几年县令,就被他提拔到户部当了云南司主事(六品副厅级干部)。海瑞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有了更大的市场,这回他把整肃的矛头直指指向了最高领导——嘉靖皇帝。

嘉靖堪称天下第一古怪皇帝,正式职务是“天子”,业余职业是“道士”,还利用职务之便把道观建在了皇家禁地。二十几年不上朝办公,反倒孜孜不倦地烧香炼丹。你可别以为他是那个无比虔诚的教徒,他求的是多当几百年“真龙天子”,荣华富贵享受得长些,再长些!忠直耿介的海瑞是发自内心地维护最高领导的光辉形象的,是发自肺腑地维护人民利益的,岂容领导这样胡作非为?所以,他安排好家事,准备好棺材,写出了震撼古今

《七律·和柳亚子先生》

亚子等民主人士交谈时局和前途等重大问题,柳亚子感到深受启发。诗句只提“索句”(指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要诗词)这样的私人交往,但当事人是不会忘记当时的重大政治斗争和历史背景的。第三、四句写二人目前在北京的第三次会晤,这次会晤当然不只是为了“华章”(美好的诗词)的酬唱,而是为了筹建新中国。以上四句明写私人交往,暗含曲折的革命斗争和当前筹建新中国的历史壮举,既表达了对柳亚子的深厚友情,又可唤起柳亚子对几十年革命经历的回忆和对当前国家大事的关注,为下面的规劝作了必要的铺垫。下半首的四句针对柳亚子的牢骚给以亲切规劝,似批评却毫不涉及品质问题,突出的是对柳亚子身心的关心体贴。尾联是针对柳亚子《感事呈毛主席》中“安得南征驰捷报,分湖便是子陵滩”而发。柳诗的意思是打算仿效东汉的严子陵,把故乡分湖当做富春江的子陵滩去隐居垂钓。毛泽东劝柳亚子打消归隐念头,留在北京参政议政,但诗句只劝他“观鱼”,暗示绝不会让他因公务而劳累,再一次表达了对他身体的关心,与上文的“防肠断”是一致的。“观鱼”的意象来自庄子与梁国相惠施在濠上观鱼

以高远谈吐为真学问、大学问,彼此赞赏是纸笺礼节,互相批评是茶杯波澜,可以称为学术游戏。雅学与俗学相比,品位是高了还是低了?没有了鲜活生命,精神贵族的自负是知识自闭症,他们或被社会轻慢,以腐儒视之,或被社会高捧,敬而远之。边缘书生的性格越来越内向,圈子越来越狭小,越讲声音越微弱,最后演变成社会角落里的自言自语,间或发些不被重视的无奈牢骚,至多属于怨妇情结。

德国诗人歌德在《浮士德》中说:“理论是灰色的,生命之树常绿。”我们如何理解这句名言?精英与世俗对立是作茧自缚,学者需要自我救赎、自我解放。国家学术与国家行为无关,妄称国学。进入感性生活,近距离体验社会百态与大众情怀,是人文学者的必修课。要说“活人”的话,才算活人在说话。大众听得懂、做得到,自己也做,履行社会责任,求得学者真诚,让风干了的经典再度鲜活起来。

“新文化”运动是革命,否定了帝王之“道”,反对封建主义。“新国学”思潮是再革命,否定坐而论道,反对历史唯心主义。民主共和是“新文化”运动的外生动力,引导中国进入现代社会;文化复兴大业是“新国学”的内生动力,引导国学进入现代社会实践。这能不能看成否定之否定的过程?

(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,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)

中外的名疏——《治安疏》。在这篇疏中,海瑞直言无忌,痛斥嘉靖为求长生不老一心一意炼丹修道、刚愎自用只喜阿谀奉承,骄奢淫逸滥用民力、二十多年不上朝办公、私生活方面薄于夫妻父子情分,几乎是从做皇帝、做丈夫、做父亲等各个方面彻底否定了这个人。历朝历代敢骂皇帝的不乏其人,但骂得如此决绝,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!要知道,嘉靖是个暴君,忠心耿耿的臣子杨爵、杨继盛、夏言等人都惨死在他手中,可偏偏骂他最狠的海瑞逃过一劫,为什么?

首先,嘉靖是暴君而不是昏君,他盛怒之时也想千万万刚了海瑞,但冷静一想,海瑞愿做千古忠直之臣比干,他可不愿做千古昏荒之君纣王。其次,嘉靖的近侍大监黄锦是个厚道人,说海瑞正在家等死呢,及时扑灭了嘉靖的第一把怒火。因为黄锦让嘉靖明白了:臣不畏死,奈何以死惧之?第三,如果当时严嵩为首辅,必定向火坑里踹海瑞。偏偏是徐阶为首辅,他轻轻一句话:“海瑞只想以死求名,皇上千万别上当。”便挽狂澜于既倒了。

嘉靖想做聪明人,海瑞也保住了性命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)

“出格”一词,解释通常有两种:一指超出常规,异乎寻常。最早见唐人张籍的诗句:“今体诗中偏出格,常参官里每同班。”二是特指旧时应制文字和表章等,遇到尊称则另起一行抬头书写。明人方以智《通雅》载:“写表章别起行头者,谓之跳出。智以为即今之出格尊称题式也。”清人平步青《霞外攬屑》中云:“故遇我国家,我皇上,皆以‘国’字、‘皇’字跳行,出格敬谨书写。”意思是表章中为了表示敬重,凡遇到“国”、“皇”等字,都要另起一行,并顶格(或出格)书写。

显然,第一种解释中的“格”是指诗词格律,而第二种解释中的“格”则是指书写应制文字或表章所用纸上的界格。这就与写字或书法挂上钩了。

【书法茶座】

各式各样的书法界格

□杨加深

众所周知,在学习书法的临摹阶段,为了把字写得酷似原帖,人们使用界格对每个字及其偏旁部首进行分区定位的方法,就是临书界格。目前常见的临书格,有九官格和其他各种各样的“变九官(格)”,如回官格、田字格、米字格、十六格等。无论那种格子,都非常有助于初学者掌握所临写之字的整体结构和局部定位。我的问题是,如果把一个字或这个字的某一部分写得过大、过长或过宽,超出原帖的位置,是不是也可以被理解为“出格”呢?换言之,相对于上述解释,“出格”一词,是否与书法临摹中的这种“界格”关系更近呢?何况最早的书法界格——九官格,传为唐代书法家欧阳询所创,若此说可靠,则在时间上也是早于张籍的。

当然,以上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,事实是否如此,暂且不去考察。但借此来介绍一下中国书法史上各式各样的书法格子,倒是很有必要的。九官格传为欧阳询所创,我认为不是空穴来风,至少创始于唐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唐朝是一个书法的尚法时代,楷书盛行,而整齐有序的唐代楷书,一般都是使用界格。所以,这时候产生“九官格”,是合乎书法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具体需求的。当然,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一下,这个使用格子的习惯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北魏甚至周朝。但与后来的九官格及“变九官(格)”相比,此前的格子只是为了界定一个字或一行字的位置而已,而后来的九官格及“变九官(格)”则是将一个字分割成多个形状相同的区域。或者说,前者的定位是从整篇考虑的,而后者则更强调给每一个字的部件定位。

九官格之命名,是因为采用了“九官”的形式,即一个大方格内含有九个相同的小方格,组成九宫。中间一小格称“中官”,上面三格称“上三官”,下面三格称“下三官”,左右两格分别称“左官”和“右官”。创立九官格的目的,一是为了准确定位;二是便于字体的缩放。或许一提到“九官格”,我们会联想到欧阳询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,其实二者之间没有关系。“九成宫”建于隋文帝开皇年间,始名“仁寿宫”,唐太宗贞观五年(631)修复扩建后才更名为“九成宫”,“九成”意为“九重”或“九层”,言其高大,与九官格毫无关系。

时至元代,书法家陈绎曾进一步发展了九宫结构。他在《翰林要诀》中说:九宫。八面点画,皆拱中心。简缘云:欧法最近……结构,随字点画多少疏密,各有停分。作九九八十一分,界画均布之。先于锤、王、虞、颜法帖上,以朱界画印,印讫,视帖中字画分数一一临拟,仍欲察其屈伸变换本意,秋毫勿使差失。法帖字大,以小印分数蹙之。法帖字小,以大印分数展之。虽以《黄庭》、《乐毅》,展为方丈可也。

这段话表达了三层意思:一是认为最能体现九宫特点的书法是欧阳询的楷书;二是改“九宫”为八十一宫,更便于对前人法帖的精确定位和临摹;三是通过这种方法,可任意缩放字体而不会失真。

清朝书法家蒋骥又根据汉字结构特点与形体之不同,创九宫新式四种:三十六官;二十四官(横竖二种),分别用来写扁平体字和长方体字;回官格,用以书写方体字;田子格中上半部分加“人”字形对角线,用以书写盖(上部)似“人”字形的字。

通过长期实践,后人又改进创造了两种新的书法界格,即田字格和米字格,因这两种格式简单实用,遂成为当今最为流行的书法格子。

无论是哪种格子,都是辅助初学者临摹碑帖的手段。一旦掌握了汉字的基本点画结构,即使脱离了这些界格,我们也依然能够做到“随心所欲而不逾矩”。修炼到这个程度,我们就不会“出格”了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副院长,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)